

美國未來霸權地位演變趨勢之分析： 週期理論觀點

Analysis of the Trend that U.S.'s Dominant Status Develops: View of Cyclical Theories

翁明賢 *Wong, Ming-Hsien*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李黎明 *Lee, Li-Ming*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兼任講師

Ph. D. student and part-time Instructo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學者曾經指出，國際間霸權競爭的結果，導致世界歷史中的重大轉折，此種週期性的衝突，重組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並導向一個新而未知的歷史發展方向。

有部份研究文獻，對全球戰爭導致世界政治與經濟的歷史演變過程，進行了重要的論述。他們認為，長週期變化的情形可以經由概念與理論的說明

以了解。此即所謂，「國際政治長週期理論」。

本文的目的，在於了解週期理論對當前國際問題有無助益，並希望藉此獲得若干有用的解析意涵。經由初步的觀察與分析，本文的結論是，在 2025 年至 2030 年之間，爆發戰爭或重大變革的可能性很大。更寬廣的分析結果，在 2017 至 2034 年之間都有這種可能性。美國在未來的霸權地位，很可能因為此種週期性的變化，經由國際戰略情勢的轉變而改變。

Some scholar pointed out that great turning points in world history have been provided by these hegemonic struggles among political rivals . These periodic conflicts had reconstructe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propelled history to new and uncertain directions .

Some researches focus on large-scale organized warfare that lead to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worl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henomena and discourse important viewpoints. They believe that long-term changes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clarification. These viewpoints are called " cycl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find out that whether the cycle theory benefits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problems or not. It is also expected to obtain some useful interpretive meanings by this research. Vi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between 2025 and 2030, there is a great possibility of having a war or huge change. A broadly analytic conclusion, the possibility will exist in between 2017 and 2034. American's hegemony status may be altered by the transiting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ituation due to the cyclical changes.

關鍵詞：週期理論、國際政治、霸權、長週期

Keywords: Cyclical theor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egemony, long cycle

壹、另類視角

就國際政治與戰略格局而言，全球性強權以及權力平衡的變遷，與國際關係歷史演變互為表裡。歷史上的霸權爭奪，不僅為強權國家的長程目標，同時也促進了人類發展的主要關鍵因素。

美、蘇兩強對峙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時期結束之後，再度引發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究竟應該採取「干預」(intervention) 抑或「孤立」(isolation) 的辯論。就現況觀之，美國持續積極介入世界以主導國際權力分配的意圖有多強？就長期趨勢而論，美國究竟是面臨著一個放棄對手的退讓世代，抑或必須持續獨霸而重新尋找另一個假想敵人。兩種思維在美國學、官兩界各有擅場，學術理論與實際政策建議分歧極大。美國全球戰略持續保持全球優勢抑或趨向保守至少有兩種可能選擇，任何一種選擇均將關鍵性的主導著未來世局發展。

然而，就國際體系、全球戰爭現象的發展變遷，是否存在著某種內在演變的興衰週期的規則，有無適當的分析理論與工具，以資作為理解在當前處於單極強權美國未來戰略的走向？

國際政治研究者，一般認為國際體系為一個自助以及權力平衡的體系，具有連續性與相對穩定的特徵。國際政治的本質經久未變，國際政治的類型一再重複出現。但是，並不認為具有一個起伏曲線周而復始的週期循環。

然而，另有一些學者，認為國際政治中存在著某種可循的規律，具有升降的曲線週期 (long cycle)，所謂「國際政治週期理論」(cycl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北京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王逸舟教授，對此曾作出完整的分析與闡釋。他指出，Nikolai Kondratieff 於二十世紀 20 年代最早提出國際關係週期 (cycles) 理論。Kondratieff 提出自 1780 年至今的兩百餘年中，世界出現了三波大的經濟浪潮，每波持續大約 50 年。其後，Quincy Wright 於 40 年代，提出世界戰爭週期每 50 年左右一個週期的觀點。Arnold Toynbee 在 50 年代，自不同角度也提出了自己的週期理論，指出在整個現代歷史上，大約每隔 50 年便有一場大的戰爭。George Modelska 在 1978 年提出了「世

「世界領導權」(world leadership)的週期理論，認為自國際體系產生以來，霸權戰爭是定期發生的，霸權國家(hegemon)領導的週期平均為 100 年左右。Joshua Goldstein 在 1987 年提出了大國戰爭與經濟關聯的週期因素，指出自 1495 年以來出現 10 個長週期。而自 1648 年以來，出現了 3 個長達 150 年的大週期。Paul Kennedy 在 1987 年也寫作了《大國的興衰》一書。¹然而，大部份學者僅僅是提出了描述性的概念。僅有幾位，嘗試從週期規律或者統計分析²的方法進行論述。

王逸舟指出，之後研究上述問題的學者很多，但是各家論述不同，未有定論。主要問題是對於週期的時間點與衡量標準仍有分歧。³ Richard Rosecrance 以及 Goldstein 將近期與經濟有關的國際政治週期理論，區分為三種國際週期循環理論。包括「Kondratieff 週期」、「Modelski 週期」，以及「Goldstein 週期」。⁴ 本文除了依據 Rosecrance 所列舉的三種週期理論之外，另將 Pollins 與 Schwellef 的週期理論觀點一併分析。

本文雖然是分析有關國際政治週期的問題，不過因為限於主題與篇幅，將不論及週期形成的原因、理論邏輯、批判觀點，僅為擷取其週期時間與起迄點，以獲得具體的階段分期的陳述，作為綜合比較分析的基礎。本文的目的在於瞭解週期理論對當前問題有無助益，以及期望獲得若干有用的意義。

本文，首先將陳述當前美國對未來國際政治的宏觀戰略選擇方向是甚麼？固然，一般咸認美國必然將持續維持其獨強地位，以單極霸權角色邁向 21 世紀。不過，為了瞭解其意圖的程度與作為方式，仍然給與適量的鋪陳。其次，本文將列述各種「週期」理論，以及其關於時間點的描述。再次，則就各理論內涵作出時間差異的比較，目的在於找尋有無共通之處，以判斷其對未來問題解釋或進行預測的能力。

¹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s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² Michael Colaresi, "Shocks To The System: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The Leadership Long Cycl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5, October 2001, 569-593.

³ 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 423-429。

⁴ Richard Rosecrance, Long cyc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2, Spring 1987, pp.285-286.

貳、美國對未來戰略選擇的堅持

1907年擔任英國駐美大使的James Bryce認為，談論美國的外交政策，正如談論愛爾蘭的蛇，因為愛爾蘭根本不產蛇，因此美國也沒有所謂外交政策。知名外交政策專家Walter Russell Mead引用了此一典故，來說明美國並沒有嚴正思考此一問題的傳統，就像梅特涅（Metternich）與塔里蘭（Talleyrand）那樣，以數十年期程思考錯綜複雜的對手棋賽。美國之所以致此，主要是因為制度的原因，使國家領導階層任期太短且將精力應付在國會議員的個人利益事務方面。⁵

依據豪斯（Edward M. House）上校的說法，美國的大戰略，乃為取代英國掌控世界政治、軍事、經濟的全部角色、利益與責任。Mead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單一的美國長期戰略，人們仍然可以自歷史發展方向了解美國大戰略的軌跡。他歸納美國大戰略的來源有三點：美國的大戰略，始於在世界主要舞台的歐洲均勢同時，對西半球獨佔的想法；以海空優勢的信念以及一個經濟體系以支持這個信念的需要；以及以民主制度改變或塑造國際政治，從而獲得感覺安全的目的。

Mead認為，911之後，戰略的層級、強度以及政治的基礎均有改變：小布希（George W. Bush）的戰略第一優先置於中東，其次是東亞，再次是西歐；911之後，美國總統或行政機關的政策獲得巨大而快速的支持；然而，布希政府大抵仍然延續同樣的戰略規劃，制訂明智的戰略，但缺乏具思考的戰術。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一覽無遺表明了美國在 21 世紀戰略的延續方向。許多批評家指責布希拋棄美國兩世紀的道統，並且拋棄美國人歷史上勇敢的道德信心從事戰爭的優勢地位。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這種強調自由的價值，正是一次大戰末，威爾遜總統理想主義的回響，而勇於介入國際事務的行為，也是政治現實主義與權力政治的基礎。易言之，這些觀點主張美國應該棄絕傳統孤

⁵ Walter Russell Mea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a World at Risk", *Orbis*, Elsevier Limited on behalf of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all 2005.

立主義，而以強權角色積極擁抱世界。⁶ Thomson 則認為，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顯現了民主主義的現實主義精神，就類型學而論乃兼具了傳統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形式。亦即包含了：在海外使用軍事力量的意志、民主的角色、外交政策上的道德成分、多邊主義與國際建制、美國例外主義、美國未來霸權。⁷

美國並不認為，「後 911 政策」引發了其他國家軍費支出的顯著增加，同時造成了對其他國家的威脅。美國寧可信其有，國際體系的發展，並不會退回到權力抗衡的舊思維。就現況來說，無論就硬抗衡或軟抗衡而論，也很難找到任何其他國家抗衡美國的有力證據。以中共為例，中共的國防建設並不新進，同時也不像是因為需要對抗美國威脅應該做的那麼武斷與野心。中共的戰略核武器現代化計劃雖然經常在涉及對美抗爭的行動中被提及，然而其庫存武器卻仍屬十年前的型號。尚且，即便中共未來數年有能力部署新的飛彈，但是否能夠擁有相對美國的核子報復存活能力仍不清楚。美國人認為，在後 911 時代，中共國防的建構不是一個特定的對美國抗衡行為的有說服力的觀察指標。⁸

美國負責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 Thomas Christensen 指出：「美國採取的政策應促使中國成為全球這樣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這實際上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關鍵所在。美國對華政策須兩方面結合，一方面積極與之保持接觸，最大限度地擴大擁有共同利益和相互合作的領域；另一方面也應該承認，我們需要維持美國在該地區的實力，以防中國最終走的道路不符合我國利益」。⁹

論者有謂，認為美國將走向孤立主義的方向是錯誤的，沒有跡象顯示大部份美國人對世界事務的熱心已減。對布希總統伊拉克政策失望的人，仍然只是

⁶ David M. Kennedy, "What "W" Owes to "WW"," *Atlantic Monthly*, March 2005, pp.36,38,40.

⁷ Thomson, Andrew David, M.A., *Democratic realism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 2005, 182 pages.

⁸ Keir A Lieber,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Summer 2005, Vol.30, Iss. 1; pp. 109-139.

⁹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 2006.08.04,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69899.htm>.

少數。¹⁰

小布希追求國家利益的強勢戰略是，美國做為全球領導地位，以及以軍事為後盾支持自由、民主與自由市場價值觀的美國帝國，不會受到任何挑戰。而軍事力量的目的在於支持獨立自由美國面臨的挑戰，以及消除一切反美的政權、組織與價值。小布希的戰略或外交政策乃基於「新保守現實主義」（Neo-Conservative Realism），其先決條件即是以強化國防支持全球領導地位；國家利益的成份包括軍事能力與美國價值制度的擴散；為和平之必要，將發動為數不多的殘酷戰爭；遠離現實主義富有同情心的多邊主義，採取含蓄的單邊主義的信念。簡言之，小布希的戰略較現實主義利益概念的界定更為寬廣，它的對象也包括了非國家行為體。¹¹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歷任美國總統的戰略有著微妙的轉變。19世紀美國的大戰略是簡明的，它的方法主要是單邊的：避免捲入歐洲權力平衡之中、支配西半球、在亞洲採取門戶開放政策。20世紀初始，美國的工業勢力使其取代了英德兩國，而且運輸革命將美國與歐洲拉的更近。這些條件，使美國後來的六位總統企圖在未來的百年中轉變美國的大戰略。¹²

首先是 William McKinley，他屈服於美西戰爭之後美國對殖民擴張的誘惑，陸續取得了關島、菲律賓，以及波多黎各。Theodore Roosevelt 繼之以軍事與國際政治力量，尋求轉變美國的外交政策以適應美國在新世界中的角色扮演，並說服國會支持他對美國霸權的努力。但是他未能克復國會以及民眾之間長久的懷疑，因而這種轉變企圖未能守成。Woodrow Wilson 企圖改變美國的大戰略，以民主與國際制度創造世界新秩序。Franklin Roosevelt 是第一位成功轉變美國大戰略的總統，他藉著說服國人反德、日的侵略行為，使美國走向多邊主義。他破碎了孤立主義與單邊主義，引用了 Wilson 的理想，在二戰後以軟硬性權力在軍事政治與經濟方面介入世界。Roosevelt 的寬廣戰略，持續了

¹⁰ Andrew Kohut, "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Smaller Stick," *New York Times*. Mar 24, 2006. pg. A.19.

¹¹ Mohammed Nuruzzaman, "Beyond the Realist Theories: "Neo-Conservative Realism" and the American Invasion of Iraq,"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06) 7, 239–253.

¹² Joseph S. Nye, Jr., 2006,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U.S.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Jul/Aug 2006. Vol.85, No. 4, pp. 139-45, 147-8.

半個世紀。因為，Harry Truman 繼承了 Roosevelt，並引入了圍堵與穩固聯盟的轉變作為。同時，捷克危機與韓戰，幫助他克復了國內孤立主義的阻力。後來，冷戰時期的總統，也都繼承了 Roosevelt 與 Truman 的戰略轉變，而且做了更多的改變。例如：Richard Nixon 向中國傾斜、Jimmy Carter 強調人權、Ronald Reagan 拒絕低盪（détente）直呼蘇聯為邪惡帝國、George H. W. Bush 主持了冷戰的結束。

小布希繼任之初就如一個傳統現實主義者，對於外交政策興趣並不多。他想轉變美國大戰略的雄心，只是在 911 事件之後。正如歷史學家 John Lewis Gaddis 所說，小布希的新原理（emerging doctrine）是「福山 + 軍事力量」（Fukuyama plus force），以及藉著促使全球民主化以消除恐怖主義的設計。阿富汗是第一個目標，伊拉克則是下一波攻擊做合適的地方。

「新保守現實主義」（Neo-conservative realism），最好被視為美國當前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戰略的實際內涵，而非國家行為的一般性理論來瞭解。2000 年小布希贏得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在當時的行政體系內，國家安全顧問賴斯（Condoleezza Rice）、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等人為所謂「頭腦清晰的現實主義者」。而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副部長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國防政策次長費斯（Douglas Feith）與李比（Lewis Libby）等人，則被稱之為「新保守現實主義者」（neo-conservative realists）。其理念為：增加國防費用以支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挑戰敵視美國價值與利益的政權、促進全球政治與經濟的自由、建立支持美國安全繁榮與情操的全球秩序。「新保守現實主義」，併合了意識形態與軍事兩個面向，旨在建立以美國的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的世界秩序。¹³

美國霸權或半帝國（semi-empire），將如何被超越？美國期待使用其霸權，以在國際政治中的單極過渡時間中創造超越霸權與共存的世界新秩序。這如何與美國尤其是布希政府調適，關鍵在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國內政治之間的折

¹³ Mohammed Nuruzzaman, "Beyond the Realist Theories: ‘Neo-Conservative Realism’ and the American Invasion of Iraq,"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06) 7, 239–253.

衝。¹⁴

客觀的看法，顯得格外重要。俄羅斯學者烏特金（A. YTKHH），在世紀末以一位脫不了立場敏感性的角色，依據美國國內相異的各種觀點作出相當客觀的分析。¹⁵他指出：從歷史的事實以及長久以來美國領導人物的許多說法中看出，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數十年如一致，並不因蘇聯解體消失而改變，那就是在世界上佔優勢，控制國際發展。而美國認為自己切身的國家利益，正如美國前總統布希所說的：「是任何敵對國家或國家集團控制歐亞大陸」；或美國國防部於 1992 年的文件內容：「美國必須防止各工業大國向我國的領導地位挑戰的企圖，或企圖改變既有政治或經濟秩序」。烏特金認為，美國欲達成此種戰略目標，則有賴動用美國資源以控制相互依賴的國家間結構，以及誘導和擴大民主的制度結構。冷戰結束後，取代兩極體系穩定論的卻是在理論思想上完全對立的單極霸權穩定論成為主流，互賴理論也成為熱極一時的國際交往規範，這些正是為著持續維持美國優勢的政策而辯護。

然而，烏特金也指出了美國另外一種截然相反的政策觀點。這些論點認為，美國的優勢和維持優勢的決心不可能無止境地存在下去。烏特金列舉了這些觀點：第一、即使美國經濟的繁榮將持續，但是美國在全球產品中的比重以及相應的全球影響正在開始下降；第二、美國主要學術刊物《外交》以及《外交政策》期刊，就曾經指出：美國人民應當意識到自身資源是有限的；美國應當首先從國家範圍內實現美國傳統價值和原則的世界新秩序。這些論點，反映了對國家政策偏向謹慎方面的變化；第三、在亞洲與歐洲若干對超級大國地位覬覦者的崛起，以及世界上重要戰略地區的動盪不安，均挑戰並威脅著美國的獨強地位；第四、關於民主國家不好戰的論點經不起歷史分析，市場經濟和民主不可分割的關係同樣缺乏證據；第五、國家間相互依賴有利穩定的理論，也經不起歷史證據的批判。

美國對於未來的戰略抉擇，究竟是選擇單方面行動還是聯盟戰略，選擇單

¹⁴ James J Hentz.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mmunitarianism, and U.S. Grand Strategy: Whither Africa?"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Thousand Oaks: Aug., 2005.Vol.48, Iss. 12; pg. 1558, 19 pgs】

¹⁵ 趙思新譯，〈下個世紀的美國戰略〉，《國外社會科學文摘》，2002 年第 2 期，頁 25-29。

獨的優勢還是尋求均勢？烏特金指陳了美國呈現的兩種態度：第一種態度目前在美國權力機構中佔統治地位。它不準備分享控制職能，它對離開、失去控制關鍵地區的可能後果的恐懼在加強。1947 年有 68% 的美國人支持美國在世界上的積極作用，最近數十年來，「思想積極的」美國人的比重從未降到全部美國人口的 65% 以下。第二種態度的支持者指出，任何勢力都不能使全世界的遏制變成永恆的、甚至是持久的。美國不承認其承諾和實現其領導地位的限制，將使國家走向破產。謹慎的戰略應該是穩定的世界均勢，世界領袖的背後必須永遠站著一批地區領袖做為助手。然而，美國目前不準備讓中國居於東亞首位。它頑固地等待著該地區這一面積最大國家的進一步演變。

無論任何理由，現實主義的典範精神彌久長存。在沒有其他明顯而直接的影響因素外，美國即使作最不智的打算，也不會選擇主動退出競局的政策與戰略。然而，美國是否能夠堅持目標成就其帝國霸業，也許從歷史發展大格局的層面觀察，可以獲得若干有用的啓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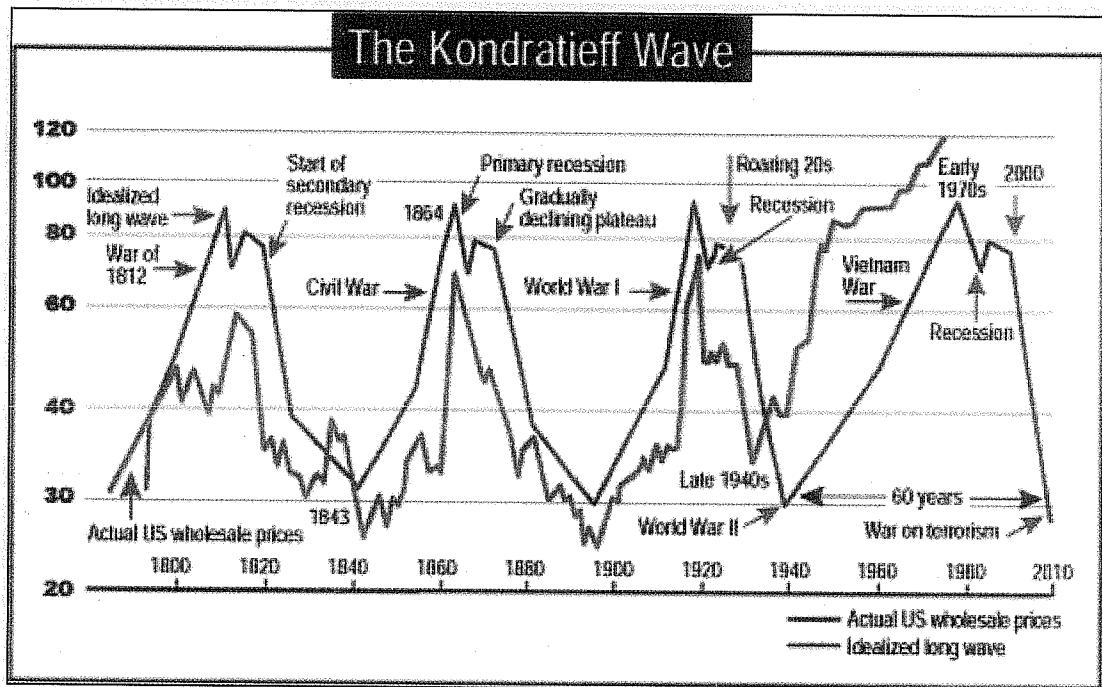
參、週期理論的命定？

「國際政治週期理論」，並非當代研究國際政治變遷的主流，甚至被視為宿命論的托詞。週期理論的發展並未臻於成熟的階段，理論觀點存在明顯的分歧。然而，「國際政治週期理論」的研究取材並非憑空杜撰，研究方法也有部份採取量化的統計分析。就科學研究的概念而論，有其存在與探究的價值。

對此領域提出論述的學者，大部份偏向觀點的闡述，僅有少部份從事週期階段的模式化。本節僅就已提出分析模型的四種論述，逐項列舉如下。

一、Kondratieff 週期理論

俄國經濟學家 Nikolai Dmyitriyevich Kondratieff (1892 - 1938)，於 1926 年首次提出自 1780 年至 1920 年，世界生產與價格變動的 3 個週期。每一週期包括上升階段 (start-up periods) 以及下降階段 (alternation of periods)，全週期蓋約 60 年，Modelski 稱之為 K-waves。見圖一。



圖一 Kondratieff wave 圖

資料來源：[kwaves.com, http://www.kwaves.com/kond_overview.htm](http://www.kwaves.com/kond_overview.htm).

第一個週期：1780 年代後期到 1790 年代早期，至 1810 年與 1817 年前後，此一段時間為本週期的上升週期。1810 年到 1817 年間，至 1844 年與 1851 年前後，此一段時間為本週期的下降週期。

第二個週期：1844 年到 1851 年間，至 1870 年到 1875 年左右，此一段時間為本週期的上升週期。自 1870 年到 1875 年間，至 1890 年與 1896 年間，此一段時間為本週期的下降週期。

第三個週期：1890 年與 1896 年間，至 1914 年到 1920 年間，此一段時間為本週期的上升週期。本週期的可能下降週期，自 1914 年到 1920 年間開始。

Kondratieff 認為，在每個週期上升以前以及在上升的過程中，伴隨著（1）技術方面的重大改進；（2）世界經濟體進入新的國家；（3）黃金生產與貨幣循環中的變化此三種情況，（4）戰爭與革命等社會劇變與緊張情勢愈嚴重。¹⁶

¹⁶ George Modelski, "Kondratieff"

延續Kondratieff的週期論點，Walt Rostow將 1920 年至 1932 年，描述為第三個週期的下降週期，1932 年至 1950 年描述為第四個週期的上升週期，1951 年至 1972 年為第四個週期的下降週期，1972 年以後為第五個週期的上升週期。¹⁷

二、Modelski 週期理論

美國國際政治學家 Modelski，在 1978 年就 1494 年以來的 500 年間國際衝突與領導權的週期模式，作出了更有系統的論述。

表一 Modelski 週期表

<i>Global war phase</i>	<i>World power phase</i>	<i>Phases of delegitimation and deconcentration¹⁹</i>
1. 1494–1516 France is the challenger during Italian and Indian Ocean Wars	1516–1540 Portugal is leader	1540–1580
2. 1580–1609 Spain is the challenger during Spanish-Dutch wars	1609–1640 Netherlands is leader	1640–1688
3. 1688–1713 France is the challenger during wars of Louis XIV	1714–1740 Britain is leader	1740–1792
4. 1792–1815 France is the challenger again during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1815–1850 Britain is leader again	1850–1914
5. 1914–1945 Germany challenges during World Wars	1945–1973 United States is leader	1973–?

資料來源：Richard Rosecrance, Long cyc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2, Spring 1987. p. 288.

Waves,”<http://faculty.washington.edu/modelski/IPEK WAVE.html>.

¹⁷ Richard Rosecrance, pp.286-287.

他指出：1494 年至 1580 年，為葡萄牙稱霸時期。1580 年至 1688 年，荷蘭是最重要的國家。1688 年至 1792 年，英國成為最主要國家。1792 年至 1914 年，英國再度成為主導國家。1914 年至 1973 年，直到 20 世紀後期，美國成為世界霸主。Modelski 的國際政治「長週期理論」提出了「世界領導者」以及「挑戰者」兩項核心概念。隨著世界強權國家的衰弱，其領導世界的合法性逐漸消失，謀求取得世界領導者的挑戰者開始出現並發起挑戰。以世界強國為中心所建立的世界政治體系在經歷一定時期後都會崩潰瓦解，而被一個世界新興強權所取代。但是，近 500 年來的挑戰均未成功，最後成為新的世界領導者的國家，都是先前世界領導者的同盟國或合作者。

在每個週期裡，都出現如下階段：(1) 全球戰爭 (global war)；(2) 世界領導國的出現與被承認 (world power)；(3) 霸權國家的合法性被拒絕 (delegitimation)；(4) 權力逐漸分化 (deconcentration)。¹⁸末兩項在週期內的時間分佈，在表一內歸併如第三欄。¹⁹上述，第 (1)、(2) 階段，對秩序的需求高。第 (3)、(4) 階段，霸權穩定；第 (1)、(4) 階段，為戰爭與權力的分散狀態；第 (2)、(3) 階段，霸權領導建立秩序。²⁰

Robert Gilpin 對此作了詳細的詮釋。他指出：世界政治變革的前提，在於現存社會制度與變革後受益最大的行為者之間的權力再分配。如果國際體系中重要國家的利益及其相應的權力長期維持平衡穩定的狀態，或權力關係僅僅維持在原有比例的分配變化，則此種體系仍能持續處於均衡狀態。然而，由於國際體系內部政治、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成員國之間終將出現不平衡態勢，這種實力增長的差異最終導致體系發生權力重分配的改變。²¹

Modelski 提出了 5 個長週期，大約 120 年出現一次，並分成 4 個為時各

¹⁸ George Modelska,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No. 2, Varieties of Modernization (Apr., 1978), pp. 214-235.

¹⁹ Richard Rosecrance, *Long cyc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2, Spring 1987. pp. 283-301.

²⁰ George Modelska,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pp. 30-31。

²¹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44-145; 204-205.

30 年的階段（phase）。Modelski 稱此為全球政治的演變「典範」（paradigm），認為全球政治體系是政策或者戰略的母體；全球政治構成一個複雜體系並在可辨識的情況中演變；其過程為革新變化、合作、選拔以及強化；全球政治與全球經濟，社會和輿論等等因素共同逐步形成。進化的典範，尤其顯露在全球層次的制度形式與世界強權的興衰過程之中。²²

Thompson持續發展Modelski的理論，並將時間週期延伸至 2080 年。見表二。²³

表二 Thompson的修正表

Lead Economy	Leading Sector Indicators	Start-Up Phase	High Growth Phase
Portugal	Guinea gold	1430–1460	1460–1494
	Indian pepper	1494–1516	1516–1540
The Netherlands	Baltic and Atlantic trade	1540–1560	1560–1580
	Eastern trade	1580–1609	1609–1640
Britain I	Amerasian trade (especially sugar)	1640–1660	1660–1688
	Amerasian trade	1688–1713	1713–1740
Britain II	Cotton, iron	1740–1763	1763–1792
	Railroads, steam	1792–1815	1815–1850
United States I	Steel, chemicals, electronics	1850–1873	1873–1914
	Motor vehicles, aviation, electronics	1914–1945	1945–1973
United States II?	Information industries	1973–2000	2000–2030
	?	2030–2050	2050–2080

資料來源：William R. Thompson, “Systemic Leadership, Evolutionary Proce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Unipolarity Ques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8, 2006, pp. 1–22.

²² George Modelska, “Evolutionary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6) No. 40, pp.321-342.

²³ William R. Thompson, “Systemic Leadership, Evolutionary Proce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Unipolarity Ques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8, 2006, pp. 1–22.

三、Goldstein 週期理論

美國學者 Goldstein，於 1984-86 年的三篇論文分析戰爭與經濟的關係，區分了 1495 年以來的 10 個長週期。而自 1648 年以後，出現了 3 個長達 150 年的大週期。第一個 150 年的大週期，從 17 世紀中葉到 18 世紀末葉。第二個大週期，從 19 世紀初到 20 世紀中葉。第三個大週期，從 20 世紀中葉到 21 世紀末葉。(見表三)

表三 Goldstein 週期表

Date	<i>Initial hegemon</i>	<i>Challenger</i>	<i>Hegemonic war</i>	<i>Restructuring treaties</i>
1648-1815	Netherlands	France	Thirty Years War (1618-48) French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1793-1815)	Westphalia Congress of Vienna
1815-1945	Britain	Germany	World Wars I & II (1914-1945)	Yalta and treaties ending World War II
1945-?	United States			

資料來源：Richard Rosecrance, p.295.

Goldstein 認為，每一次霸權戰爭都與世界範圍的價格上升吻合，霸權戰爭與經濟繁榮之間存在明顯的關聯。他並預測未來生產週期的上升期，將從 1995 年到 2020 年前後，霸權戰爭的階段基本上與此相符或稍晚一些，即從 2000 年到 2005 年間，至 2025 年到 2030 年左右，價格的攀升期則大約從 2010 年至 2030 年。²⁴

²⁴ Joshua Goldstein, "Long Cycl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War : Toward a Synthetic The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September 1984); Joshua Goldstein, "Kondratieff Waves as War Cyc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9 (December 1985), pp. 411-444; Joshua Goldstein, "Long Cycles in War and Economic Growth," Vol. 1, and Z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6).

四、Pollins 與 Schwellef 的解釋

美國俄亥俄大學學者Pollins與Schwellef在 1999 年的一篇論文分析了美國長期以來外交政策的演變週期趨勢，闡釋了美國對國際事務「干預」或「孤立」的規律。他們提出一個併合國際體系和國內兩個層次的分析方法，以理解美國在其外交政策定向的過程中「內向性」(introversion)與「外向性」(extroversion)之間的擺動規律。²⁵他們指出：美國外交政策的擺動，與美國以及世界經濟的成長與衰退有關，而非僅僅是無法理解的週期循環；世界經濟狀況與美國外交政策搖擺行為之間的關聯，係建立於對美國國內政治分析之基礎上。美國的利益與能力是國際體系與國內因素互動影響而生，而非內生的。

Klingberg 的理論揭示了美國在內向型的時期比在外向性時期較少從事軍事爭執。Pollins and Schweller 依據新資料補充後發現，自 1816 年至 1992 年之間，美國介入國家間軍事爭執共有 9 次，除了越戰（1965-1973）是在外向性時期結束之時（1966/1967）開始之外，其餘均在外向性時期之內發生。表四為 Klingberg 週期時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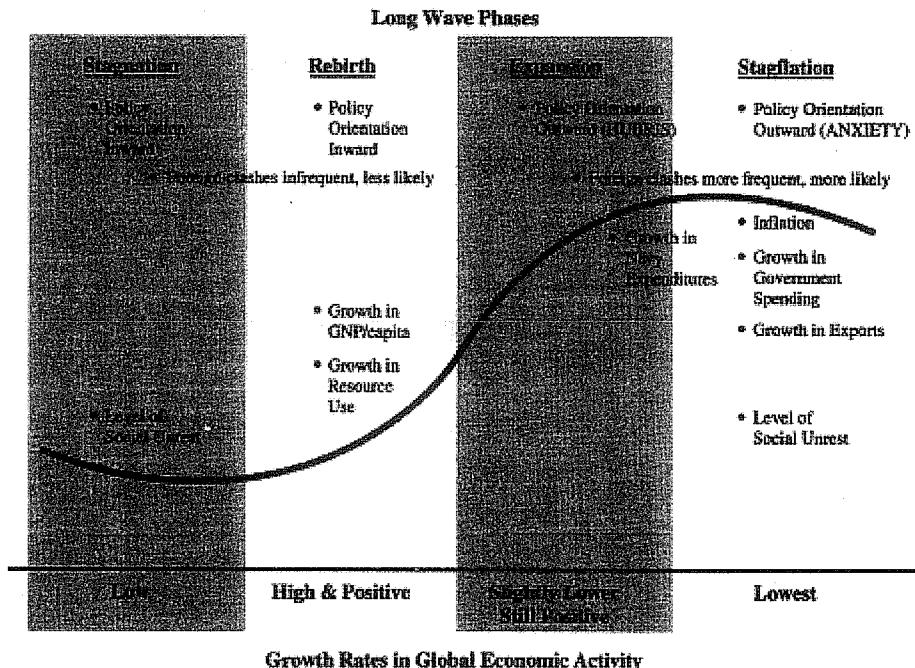
表四 Klingberg 美國「內向性」與「外向性」週期時間

Introversion Dates		Extroversion Dates	
1776-1798	(22 years)	1798-1824	(26 years)
1824-1844	(20)	1844-1871	(27)
1871-1891	(20)	1891-1919	(28)
1919-1940	(21)	1940-1966/67	(27)
1967-1987	(20)	1986/87-2014?	
Avg = 20 years		Avg = 27 years	

資料來源：引自 Brian M . Pollins and Randall L . Schweller, p.435.

依據前述三個假設，經濟景氣將帶來國家外向擴張的傾向，國內動盪也有可能刺激菁英升高國外衝突以轉移大眾不滿，至少，國外衝突的後果將降低經濟發展。

²⁵ Brian M . Pollins and Randall L . Schweller, "Linking the Levels : The Long Wave and Shifts in U.S. Foreign Policy, 1790-1993,"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 43, No. 2, April 1999, pp. 431-464.



圖二、Pollins and Schweller 週期圖

資料來源：Pollins and Schweller,p.454.

依據 Pollins and Schweller 分析的結果，景氣週期分為停滯（Stagnation）、復甦（Rebirth）、擴張（Expansion）、膨脹性蕭條（Stagflation）四個階段。（見圖二）。在後兩個階段中，國家外交政策是外向性的。與 Klingberg 的結論不同之處是，Pollins and Schweller 認為，在經濟「停滯」階段，國內社會動盪不安，此時國家外交政策亦屬內向性。而外交政策的外向性僅出現在「擴張」以及「膨脹性蕭條」兩個階段。易言之，國內社會動盪不安的情況不必然引發外交政策的外向性。

總結 Pollins and Schweller 「兩個層次」(two-level) 的分析途徑，在停滯、復甦的第一、二階段，均屬「內向性」的性質，國家對外交往既無意願亦無能力。此即為 Klingberg 所說，國家為獲致領土或影響力穩定、國家復興、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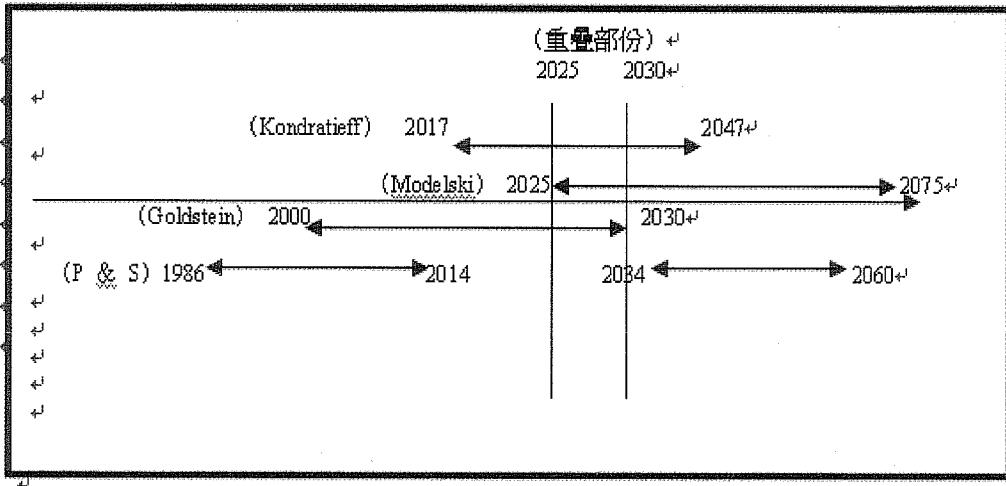
準備日後對外挑戰與欲求的時期，亦為 Smith 所描述的美國在 30 年代與 40 年代早期的情況，以及 Goldstein 所說的復甦時期，Klingberg 所稱的內向性。第三、四階段乃為經濟發展處於高峰時期，具備物質能力與擴張動機。亦即 1895-1919 時期，美國的擴張主義目標；Goldstein 指涉的擴張與膨脹性蕭條；以及 Klingberg 所說的外向性。簡言之，當美國具備其能力與動機時，則會展現其外交政策的外向性。

肆、「國際政治週期理論」的驗證與意涵

Modelski 在構建其週期理論的過程中曾經強調：國際體系的週期性演變並不意味著簡單的輪迴，全球戰爭也不一定會宿命式地爆發。²⁶「國際政治週期理論」的不同解釋，是否弱化了理論意涵，並且增添了宿命論的質疑？週期理論的理論前提假設，具有何等深層意涵，代表著甚麼意義？本節將依次說明如下。

在 Kondratieff 週期中，Rostow 延續 Kondratieff 的週期論點，認為 1972 年以後為第五個週期的上升週期。因為每一週期蓋約 60 年，同理可推 2032 年開始則為第六個週期。而 Kondratieff 指出，在每個週期上升以前以及在上升的過程中，戰爭與革命的社會劇變情勢嚴重。因此，2032 年前後，亦即 2017 至 2047 年之間，存在戰爭的可能性。（見圖三）

²⁶ George Modelska,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pp.93-98,223-224.



資料來源：自製。

說明：←→ 雙箭頭，代表「國際戰爭」可能爆發的時間區間。

→ 單箭頭，代表西曆時間序列。

圖三 週期比較圖

在 Modelska 週期中，1973 年進入第（3）階段，霸權國家的合法性被拒絕；2000 年進入第（4）階段，權力逐漸分化；至 2030 年則進入第（1）階段，為全球戰爭的狀態。依此觀之，2030 年之前，局部或潛在的衝突即可能提前就顯現，全球爆發戰爭的跡象即屬明顯，之後即進入全球戰爭時期。（見圖三）

在 Goldstein 週期中，Goldstein 已經預測霸權戰爭階段可能位於 2000 年到 2030 年之間。（見圖三）

從 Pollins and Schweller 的觀點而論，國家處於困頓的情況下，將激勵領導人尋求對外冒險行爲；充裕的財力與擴軍導致武力的糾纏；經濟成長產生社會對外擴張的需求。此外，當全球經濟成長率處於持續停滯與開始復甦的兩個階段，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政策取向是「內向性」的，對國際事務涉入不多；而當全球經濟成長率由最高逐漸減緩至開始下降的兩個階段，其政策取向是「外向性」的，政府支出高，外交磨擦或衝突頻繁。從 Klingberg 的分析來看，美國表現其「內向性」的平均週期時間為 20 年，表現為「外向性」的平均週

期則為 27 年，合計全週期約為 47 年。現在，則正處於 1986-2014 年間的「外向性」週期。亦即 2000 至 2014 年，正處於全球經濟循環週期的末端，亦即第四個階段的「膨脹性蕭條」(stagflation) 階段，屬於「外向性」週期的末端。2034 至 2061 年，則又進入另一週期的「外向性」階段。因此，依據 Pollins and Schweller 的解釋，1986 至 2014 年，以及 2034 至 2061 年，均屬美國積極介入世界的階段。(見圖三)

以上，就四種週期理論的比較分析，並且假設上述週期推論無誤，所有關於國際政治變遷的論述，除了 Pollins and Schweller，包括 Kondratieff、Modelski、Goldstein 三者重疊的部份乃為 2025 年至 2030 年之區間。易言之，三者均認為在此一時間爆發戰爭或重大變革的可能性極大。至於 Pollins and Schweller 反而認為在 2014 年至 2034 年之間，美國處於「內向性」週期，為淡出世界的階段。但是本文認為，「美國淡出世界」是否一定能確保世界其他地區的安定？如果答案為否定的，則四種觀點即完全一致。

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美國有可能最早自 2014 年左右開始即走向保守的「內向性」階段，逐漸淡出世界事務。美國在淡出國際事務之前，即 2014 年之前，不無可能在國際事務上的干預達於歷史高峰。或以代理人方式，將權力角色「託付」地區強權國家，完成淡出世界過渡時期的準備。因此，更寬鬆的說，2017 至 2034 年之間，均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性。

本文除了獲致上述關於主題的初步具體結論，另外在理論選用的途徑與方法上，亦有其特殊的意義。

如上所述，從「國際政治週期理論」多種差異的理論預測結果中，能夠獲致即使最少的交集成分，不能謂其毫無理論的基礎，而以簡化的宿命論視之。大理論建構的自身，本就處於高度抽象的論述層次，具有極寬廣的前提假設與論證途徑的空間，截然相反的結論有時並非毫無意義。

其次，「國際政治週期理論」的前提假設，在方法論中具有何種特殊的意義？無論週期理論家的研究初衷如何，週期理論的共通研究途徑，莫非從歷史經驗事實中獲取立論的假設與證據。就此一事實而論，已完全符合科學歸納與演繹的邏輯研究過程。在研究的取材過程中，容或標準不同，主觀認知差異，

而產生不同的結論。但吾人也須考量國際政治科學的複雜性質，體認大理論建構的困難。

伍、延伸的思考

本文探討幾種不同的「國際政治週期理論」，試從現況國際政治背景中跳脫傳統思考與分析模式，嘗試以另一種觀點審視國際政治演變的趨向。經由初步的觀察與分析，可以獲知國際政治的整體客觀環境因素，對於國際關係發展的未來影響。

由於國際體系的經濟、政治等因素的互動循環，甚至大國的意圖與能力，亦將受到整體趨勢發展的影響與支配。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大國自身的衰落，以及新興國家無可遏阻的崛起命運。本文獲得的結論，2025 年至 2030 年，以及 2017 至 2034 年之間，均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戰爭的結局必然重組大國地位與秩序，當前霸權國家命運的保持通常並不樂觀。這個初步結論，從當前國際現勢而論，並不難瞭解。但是能夠早期預見，而作出長遠規劃，則屬不可思議之舉。

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西方國際政治現實主義，長久以來主導著世界政治的運作規範，最後卻回頭毀滅這些現實主義的忠實力行者。因此，奉行現實主義主流典範的思維，是否需要作出深切的思考與修正？

另外一個問題，如上所述，美國全球戰略演變趨勢的發展，可能並非國家決策層級所能過早的洞察與避免。此一含意，是否說明了遠程「戰略規劃」的不切實際？若是，則又違背了戰略自身的意義與目的。因此，戰略規劃與作為，是否有其量化的意義與界線？如果以上皆非，無異說明了當代國際政治與戰略理論嚴重貧乏的窘境。除了思考「複雜理論」或「渾沌理論」在國際政治領域的適用性之外，我們還能做些甚麼？

